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马 歇 尔 使 华

(一)

(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翻译室译

中 华 书 局

1979.7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马 歇 尔 使 华

(一)

(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 翻译室译
近代史研究所

(征求意见稿)

中 华 书 局

1979.7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马歇尔使华
(一)

(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室译
近代史研究所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书店代发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79年7月 定价0.96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内部参考，不对外。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丛稿》不对外展览借阅，所登文稿，不要转载和引用。

译者说明

本书是马歇尔使华期间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书，于1976年在美国出版。在此以前，美国没有出版过关于马歇尔使华的完整记录，只是在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有一章（第五章）叙述马歇尔使华的经过，但第五章在该书中仅占一百二十三页的篇幅，叙述是比较简略的。由于本书的出版，马歇尔使华的记载就更趋完整了。

这个报告书的大部分是马歇尔在中国时由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人员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各部分完成后即分批寄送美国国务院，至1946年年底，已寄送了六批，共三十一章。最后三章和补遗《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是马歇尔回到华盛顿以后，在1947年2月前后完成的。

本书分一、二两卷。第一卷是报告书的正文，第二卷是附件。报告书是以第一人称，即以马歇尔本人的语气写成的。在形式上，报告书对马歇尔的出使任务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事叙述，从1945年12月出使中国开始，直至1947年1月使团被召回美国为止。应该说，报告书的叙述是详尽的，对于每一次的会谈，会谈者的对话，国共双方的建议和反建议，每一事件的经过，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第二卷所收

的附件，共有一百一十五个文件。

1946年是中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开始大规模展开，中国两种命运开始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这时，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决不是偶然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①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1946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承认：二次大战后，美国虽然也曾设想过采取直接派兵帮助国民党向中国人民进攻的政策，但鉴于国际国内形势，慑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未敢这样做，而是采取了这样的途径：“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也就是说，除了和平的一手外，主要采取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击毁共产党”，实际上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事实上，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对国民党的大规模援助，从1945年到1949年一直都在大力推行，然而由于国民党腐败透顶，民心丧尽，这一切自然都归于失败了。马歇尔使华报告就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的一部分。这一事件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但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加以仔细研究。本书虽然以貌似“客观”和“公正”的立场作了烦琐的叙述，并未涉及事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情的本质和内幕，但它对马歇尔使华的经过作了完整的详细的记录，字里行间仍能流露出美国的真实意图，作为美国方面的一种官方材料，还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中译本将本书第一卷完全译出，未作删节。至于第二卷所载的文件，经过仔细查对，认为与马歇尔使华有关的比较重要的文件，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附件中，均已列入，已有中译文，故未译出。为了读者方便起见，在中译本后面附了一个对照表，将已有中译文的文件，分别注明见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页数，以便查阅。中译本利用了原书的索引，译文旁的边码和索引中的页数均系原书页码，供检索用。

本书分两部分发表，第一部分的译者是吕浦、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一九七九年七月

目 录

绪 言

- 一 我使华的基本原则..... (17)
- 二 到达中国；初步商谈..... (21)
- 三 政治协商会议..... (23)
- 四 三人小组..... (24)
- 五 停战令..... (25)
- 六 达成关于停战令协定的会谈..... (26)
 - (a) 满洲问题
 - (b) 热河问题
 - (c) 拆除交通线障碍物问题
 - (d) 日军的解除武装与遣返
- 七 军事调处执行部..... (30)
- 八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33)
- 九 关于政协决议的争议..... (37)
- 十 恢复交通..... (39)
- 十一 军事小组..... (41)
- 十二 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42)
- 十三 达成“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协定的会谈..... (44)
 - (a) 协定的名称

(b) 宪兵和铁路警卫队

(c) 整编与统编

- 十四 向军调部发出的履行“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指令…………… (43)
- 十五 停战令在满洲的应用；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 (50)
- 十六 不履行政协决议的背景…………… (59)
- 十七 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组织与任务…………… (63)
- 十八 日本军民人员从中国的遣返…………… (70)
- 十九 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满洲的局势…………… (80)
- 二十 在我回到中国时局势的恶化；各种事件导致达成满洲临时休战协议… (84)
- 二十一 满洲暂时休战的声明；在长春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前进指挥所…………… (107)
- 二十二 满洲休战十五天期间的谈判…………… (109)
- 二十三 将满洲的休战期限延长到6月30日；在这个期间的谈判…………… (126)
- 二十四 五人会议举行会议讨论地方政府问题；冲突的蔓延和局势的恶化… (139)

绪 言

一 报告与附录；马歇尔使华文件的提供

随着现在这个出版物的问世，马歇尔使华的记录可以说是完整了，从而极大地便利了我们对美中关系中这一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的理解。如果将现在可利用的材料和几年前的材料对比一下，立即就可看出，降低档案保密等级和公布档案材料的巨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其值得钦佩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1963年出版）中，邹说不得不从零散的资料中综合他对马歇尔使华的记述，而这些资料大部分是间接的和不完全的。当时唯一可用的文件集是《中国白皮书》，它论述马歇尔使华的篇幅只有九十页的四十四号文件，加上一百二十三页的叙述。虽然在其主要梗概上邹说的处理在事实上是准确的，但缺少新的可资利用的材料所能提供的丰富性和充实性。此外，这些资料还提供了关于亚洲冷战的早期发展，关于华盛顿政策的形成，关于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以及关于中国国共两党对美国的态度的许多新鲜的知识。

以前发表的材料唯一提到这个报告的地方，见于《美国外交关系，1946年》第十卷（第七百零五页），这个文件于1972年公布。这次所提到的事实表明，1946年10月1日，马歇尔曾写信给国务卿说，正在为他准备一个详细的报告，并说，“在报告各部分完成后即分批寄送似乎是适宜的，‘因为报告包括许多不能写入我的电报的细节，这些细节国务院可能是有兴趣的。’”到这年年底，已分期提交了六批这样的报告，总共三十一章。最后三章和关于中共对美国的态度的补遗，是在马歇尔回到华盛顿以后，大概是1947年2月完成的：这三章中最后涉及到的事件发生在接近一月底，而预定的三月份的计划尚未实施。

• 在这篇绪言的准备工作中，作者对埃米莉·霍尼格女士的研究性帮助表示感谢。

在形式上，报告是对出使任务的一种直率的、主要是编年体式的叙述，从1945年12月出使任务开始直到1947年1月使团被召回。报告不时地离开严格的编年体顺序，以便对某个特殊问题提出有关的说明，例如关于从中国遣返日本人员的部分（第十八章），以及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任务的说明（第三十一章）。

这个报告主要是以第一人称，根据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写成的。许多章，特别是当形势影响到马歇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调处努力时，结尾都有对当时中国形势的一般概括。报告虽然反映了马歇尔自己的态度，但它是以非常客观和公正的风格写成的。只是偶而在报告的正文和一些附件中，马歇尔的个性和感情才流露出来。报告的主调是耐心、机智和顽强的乐观主义。

附在报告后面的是上述补遗和总共一百一十五个文件。报告的一般写法是将正文中明确提到的文件附于书后，正文中也常常有对文件的释义和摘要。按照报告辑成的方法来看，这些附件显然并不是要为马歇尔使华任务提供一个完整的文件记录。这种文件的提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量是庞大的。由于1969年与1972年分别公布了1945年与1946年的《美国外交关系》，涉及马歇尔使团本身的同类文件就有二千三百页之谱，还有大约六百多页是专门叙述虽然迂回但却与马歇尔使团有关的问题的，如租借办法、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部署、战地报告等。

这一百一十五个附件，除二十四号文件外都在以前公布过，或公布于《中国白皮书》（《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第七卷），或公布于《美国外交关系，1946年》第九——十卷。为了帮助读者利用这些文件，准备了一个核对表，指明哪个文件以前公布过，何处可以查到。

二 马歇尔使华任务的前途

1. 背景

当赫尔利将军于1945年11月27日在失败与呕气中辞去驻华大使职务时，中国的局势是极端严重的。尽管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零星的谈判

——包括蒋介石与毛泽东面对面的会谈——真正的协定并未达成，中国似乎再度走向内战的边缘。

这种前景对于熟悉中国过去二十年各种事件的人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有时——在1927年的恐怖时期和1934年长征前夕——共产党几乎被毁灭，但又残存下来并再度成长起来。迫使这两个宿敌调停其争端的，是日本侵略的残酷事实，因为他们明白，不如此，中国就要灭亡，谁也没有什么可控制了。

但1937年建立的这种统一战线不久就显示出破裂的迹象。经过大约两年的蜜月之后，摩擦又重新开始了。冲突日益频繁，达到高潮的是1941年1月的激战，即有名的“新四军事件”。但因抗日战争，双方都不愿承担发动和进行全面规模内战的责任，此后双方才都后退了一点。在四十年代初期，近四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封锁着未被日军包围的共产党地区。国共关系，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显著的特点是上层保持着冷淡的礼貌，中层是不信任与敌意，地方一级则是无控制无阻碍的斗争。

虽然日本的压力暂时中止了内战，但斗争有力地影响了两党力量的对比。国民党从长江下游基地被赶到虽然安全但很落后的华西地区，集中在重庆，被严重地削弱了。经过初期无私的抗战决心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开始产生了厌战情绪，人们开始听到，而且日益经常地听到关于腐败、恶政、镇压、通货膨胀和士气低落等令人沮丧的连祷。

共产党对日本挑战的回答却导向相反的方向，使它获得了比战前大得多的力量。日本人控制了共产党主力所在地华北的城市和交通线，但中共几乎没有丢失什么，那些地方他们从来没有占有过。在此期间，中共依靠民族要求、坚实的社会改革和有纪律的热情相结合，深入发展到了侵略者根本不能驻兵的敌后农村地区。从1940年到1943年，日本人对这些根据地施加了可怕的压力，但却无法摧毁这些根据地。从那时起，日本不得不消耗它的大部分资源，徒劳地抵抗美国的无情进攻。战争的最后两年，中共的力量又一次复苏了。

美国进入对日战争给中国局势增加了新的一面。从援助和支持方面来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图腾柱上居于低一级的等级，而欧洲则处于优先的高

位，中国几乎与各种外部供应的途径相隔绝，美国跳岛战略的日益成功甚至使中国成为更加次要的战区。虽然如此，使中国留在斗争中以牵制尽可能多的日本人力物力，对美国来说还是重要的。而且在展望战后年代时，美国设想能有一个强盛统一的中国代替日本成为亚洲的主要强国。

在美国，有一种使人烦恼的内疚感，认为对于帮助一个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单独英勇作战长达四年以上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国家来说，我们过去做的实在太少，即使现在也是一样。蒋介石和他的在美国威尔斯利受过教育的夫人在突出一个个人献身和国家声望的形象方面是成功的——在美国公众眼里，他完全是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化身。开罗会议（1943年）期间，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克服了邱吉尔的疑虑，蒋作为四巨头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对我们来说，蒋已成为中国的同义语——象他早已对待自己一样：

蒋能干那种以虚弱的地位机灵地获得成功的把戏。他以并非情愿地向日本投降作为微妙的威胁，目的在于以较好的条件获得更多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能以自己实在太弱为理由，辩解他无法以更大的力量进行抗战，而同时又暗示批评美国太小气。其实蒋早就明白，日本最后将会被美国所击败，因而他认为没有多少理由将他的力量——这种力量战后将会需要——消耗在没有必要和不受赏识的作战中。况且在一支重视效忠个人优于重视能力的军队里，经常是缺乏战斗效力的。

这种态度激怒了中印缅战区美国司令史迪威将军（刻薄老总）。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国供职熟悉情况的尖刻的步兵将领，史迪威决心完成指定给他的任务：进行抗日战争和改进中国军队的效率。由于遭到中国领导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些领导人关心的和他不一样，而且对于中国作战的比较不重要或许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史迪威与蒋及其同僚一再发生严重冲突。1944年9月，达到了严重关头，因而华盛顿面临着抉择：或者支持史迪威，这就是意味着我们与蒋的关系有一个重大改变；或者支持蒋，这就意味着要将史迪威免职。史迪威于10月被召回，接替他的是老练得多的魏德迈将军。同时，赫尔利将军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后来是大使）被派往中国。

赫尔利或许是一个和罗斯福一样自信自己人格力量的人，他负责将中国留

在抗日战争中，试行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撮合在一起，并寻求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使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起来的基础。赫尔利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但他相信，一旦共产党确知苏联不支持他们，而且如果两党都签字承认他坚持写进他大部分建议草案中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原则，那么共产党是会屈服的。在他的不完全的幻想中，共产党类似美国的一个反对党（他曾说，就象“阿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虽然他也知道，共产党是有枪的。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改变看法，以非难的措词说，要把中共领袖们当作献身的斯大林主义者和顽梗的革命家来看待。

令人惊异的，不是赫尔利使命的失败，而是起初有希望的谈判毕竟是开始了。要批评赫尔利的无知和自负是容易的，但他的失败不光是他个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的现实和美国政策的矛盾性质之中。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促使俄国仓促占领满洲，然后又导致日本突然过早投降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的投降使一切政党都感到有点缺乏准备。1945年8月和9月，国民党收复了华中和长江下游的许多地区，并坚持他们在一切地方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在此期间，中共在华北大为扩张。在9月下旬和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方几个港口登陆，以协助处理日本投降事宜，并开始了运送国军的过程。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不仅在华北，而且也在华中，都早已发生冲突。蒋和毛的会谈，就是在这种混乱时期，在赫尔利将军的鼓励下举行的。但赫尔利已感到做了有损体面的事情，于9月返回华盛顿。在华盛顿他生着气，直到11月27日才发表了一个怨愤的辞职声明，把他的失败都推到不忠诚的下级身上——这种不公正的谴责后来常常纠缠着这些人。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有决定意义的几个月里，在中国，重大事件多半是任其自流的。苏联完全占领了满洲，而只有日本侵略曾经制止了的内战，现在又有公开爆发的危险。在这种危急关头，杜鲁门总统要求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特使以大使身份前往中国。

杜鲁门总统派遣一位如此卓越的人物去中国，是把美国的威信极大地托付给使团的，并表明美国派遣使团的目的的重要性。马歇尔将军不是一个中国通，

但他对这个国家远比他的前任知道得多。他曾在中国供职三年（1923—26年），在驻天津的步兵第十五团服务。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派到该部队任职的史迪威。他们成了朋友，这种友谊一直继续到1946年史迪威逝世。史迪威在中印缅战区的困难日子里，马歇尔是他的上级，有时又是他的密友。最后，马歇尔具有从战时无与伦比的经验中获得的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

2 马歇尔、马歇尔使团和美国的政策

马歇尔将军的地位是困难的和矛盾的。严重地损伤了赫尔利使命的就是这种同样的矛盾，尽管这两个人在气质上和能力上有天渊之别。矛盾在于这种事实：瞩望于马歇尔的是作为一个中立者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处，但同时美国却只承认一方（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种矛盾的后果既是象征性的又是实质性的。

这种情况鼓励了国民党的信念（以前的各种事件未能削弱此种信念），认为美国不会，或者不能抛弃他们，不管他们如何发牢骚、批评或碍事。由于同样的原因，共产党对于美国真正中立的怀疑也由此而增加了。更为实际的是，战时和战争刚结束签订了许多对中国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协定，而这都是专属国民党的。这些协定包括诸如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租借军需品，出售剩余物资，海运和空运中国军队到满洲和华北等。马歇尔决心不使美国干涉中国内争，但他坚持要履行这些协定，即使这些协定可能对这两个抗争者产生某些难于缩小的“附带的影响”。

然而马歇尔将军不光是这种矛盾的受害者，他也是这种矛盾的部分制造者。这个报告在论述使团的起因上讲得十分简略，只提供了对华政策的公开声明和杜鲁门的正式指示信。《美国外交关系》集中可利用的文件对此提供了一个比较充分的画面。在1945年11月30日给美国武装部队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的一份备忘录中，马歇尔写道，“我想共产党将尽可能地阻挠谈判的一切进展，因为拖延对他们有利……而且拖延得越久，蒋委员长能够在满洲建立一个外表象样的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小，结果俄国肯定将建立起这种控制。”（《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第七卷，第七四八页）在其他方面，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也指出，创建一个强大而和平的中国，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它本身是值得想望的，同

时对他们来说，又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可以以此作为节制或遏止俄国在远东的影响的最好手段。

与此种考虑有关系的，是美国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政策问题。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在离美前不久，曾与贝尔纳斯国务卿和杜鲁门总统会晤。经商定运输国民党军队到满洲应成为公开政策之后，又商定做好将国民党军队海运和空运到华北的准备，但此种准备应当保密，以便使马歇尔能利用此种不肯定作为手段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果判明共产党是不妥协的和碍事的，运输工作就进行下去。

最后，马歇尔将军说，据他（马歇尔将军）的意见，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马歇尔将军问，在此情况下，是否还要他在那种不幸的不测事件中继续干下去，并协助蒋委员长将军队调运进华北。这样做将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得不取消它的自尊心和它的许多政策。

总统和贝尔纳斯先生同意对问题的这种看法……

（《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第七卷，第七六八页）

三天以后，马歇尔将军以较为明白的措辞阐明了这个决定的含意：

我曾说过，我对训令的一个方面的理解未写成书面文字，但我想我对他（杜鲁门）的希望有一个清楚的理解，这就是，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值得想望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

（《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第七卷，第七七〇页）

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副国务卿都明白地确认了此种理解。因此，马歇尔使命的一个方面与冷战考虑是分不开的，这种冷战考虑早已在支配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

只有初看之下才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理解在这个报告中一个也没有涉及（报告中对准备运输军队要保密是下达了命令，但这样做的理由并未说清楚）。报告的大部分是马歇尔使命结束之前在中国由使馆人员准备的，作为给国务院的电报的进一步阐述。将这些格外敏感的理解包括在报告中，显然是不能想象的。

虽然马歇尔有一个限制苏联在远东影响的战略需要的设想，但这些同样的理解所反映的，却是对蒋介石是否愿在和平解决中国内部困难方面进行合作的怀疑。马歇尔在华的一年中，此种怀疑增长着，直到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确信——尽管他通常试图谴责的是蒋周围的“反动派”，而不是蒋委员长本人。

在报告中，人们难得看到这个较大的战略设想，虽然有时能够在字里行间感觉到它。相反，报告使我们陷进了日复一日的谈判、建议和反建议、双方的新要求、以及谴责毫无诚意等等的战术活动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马歇尔的不偏不倚和光明正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保持着一个关于简况介绍、会见与会议的前后交错的时间表——所有这些事项几乎都包含着极为复杂的问题，其中大部分都需要紧张地运用警惕、判断和圆通的公正。他的前任的使命是一种纯粹的追求个人成就，而马歇尔却避免抛头露面，虽然对他的力量与中心地位是不能有误解的。在这种高度上，没有迹象说明他进行操纵和口是心非，在国共双方意见相反的非难面前，马歇尔很好地卫护了他的公正无私。

的确，这个报告总的来说，对国民党的批评要比对共产党的为多，在使华的头几个月、和平希望最光明的时候尤其如此。这些希望包括在三组协定中，其中第一组可间接归因于马歇尔的努力，另外两组则是直接的。第一组协定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审议，政协包括所有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会议从1946年1月10日进行到31日。政协的召开早已在讨论，但实际召开显然是任命马歇尔使华的结果。政协通过了为实现扩大政府基础和接着改组政府的若干程序和步骤。第二组协定是三人小组的工作，该小组于1946年1月7日召开首次会议，结果导致达成了1月13日的停战令，并导致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履行停止冲突的机构。第三组协定是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共产党部队为国军的基本方案的协定，这是经过长时间曲折的会谈之后于2月25日缔结的。